

宋代铜钱铸造业的盛衰与铸钱成本变动

徐东升

(厦门大学 历史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宋代铜钱铸造业由宋初开始逐步发展,到熙丰年间达到最盛,此后便呈现出衰落趋势;而铸钱成本不顾官府种种降低它的努力,却随着物价变动呈现逐渐上升趋势。也就是说,铸钱业兴盛时期,铸钱成本低;而铸钱业衰落时期,铸钱成本高。很明显,铸钱成本变动与铸钱业盛衰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而这主要是由于官府铸钱的赢利目的引起的,但由于赢利不是官府铸钱的惟一目的,导致二者之间的这种联系不是完全的正相关关系。

关键词:宋代;铜钱铸造;成本

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77(2002)04-0113-05

宋代铸钱业和其他官营手工业相比,有其特殊性。其他官营手工业虽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原料、劳动力和产品方面和市场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但基本上还是为封建官府和皇室生产使用价值,而铸钱业除了生产使用价值之外,还是官府获取财富的重要手段。本文拟从企业史的角度,分析宋代铜钱铸造业的盛衰和铸钱成本的变动,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

一、宋代铜钱铸造业的盛衰

和唐代相比,宋代铜钱铸造业规模极其庞大。唐代铸钱业最盛时期是在天宝年间,“诸州凡置九十九炉铸钱。绛州三十炉,扬、润、宣、鄂、蔚各十炉,益、邓、郴各五炉,洋州三炉,定州一炉。约每炉役丁匠三十人,……每炉计铸钱三千三百贯,约一岁计铸钱二(当为三)十二万七千余贯”^[1](卷9)。从工人数量看,每炉30人,那么绛州有工人900人,扬、润等州达到300人;从产量看,每炉只铸3300贯,绛州一年所铸也不过10万贯,全国一年所铸也只有32.7万贯。

而北宋元丰年间,“诸路铸钱总二十六监。……内铜钱十七监,铸钱五百六万贯”^[2](卷9)。就每年铜钱铸造总量而言,北宋元丰年间的506万贯是唐天宝年间的32.7万贯的15倍多。而就单个

铸钱作坊的规模而言,宋代也明显超过唐代。唐代最大的铸钱作坊在绛州,有工人900人,每年铸钱不超过10万贯。而北宋元丰年间,17个铜钱监中铸钱最少者也达到10万贯,其中池州永丰监40.5万贯、饶州永平监61.5万贯、韶州永通监80万贯、惠州阜民监70万贯^[2](卷9)。宋代铸钱监的工人数量也是很可观的。宋代铸钱监实行计功制度,在规定的时间内必须完成相应的工作量,企业的产量和工人的数量也是相应的。建州丰国监“旧有役兵五百,岁铸钱二十五万缗”^[3](卷11)。照此计算,饶州永平监、韶州永通监、惠州阜民监的工人数量都应在千人以上。并且,据李心传记载,真宗时,广宁监、永丰监、永平监、丰国监等四监,“凡役兵三千八百余人”^[4](卷16)。平均每监也有近1000人,超过唐代绛州900人的最高记录。

北宋元丰年间可谓是宋代铜钱铸造业的鼎盛时期,也是宋代铸钱业盛衰的分水岭,此前经历了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此后则逐渐走向衰落。其盛衰过程大致可用铸钱监和铸钱数量的变动予以说明:

首先,铜钱监数量的变动。北宋铜钱铸造进入发展时期是在太宗继位以后。太平兴国二年(977年),“置监于升、鄂、饶等州,大铸铜钱”^[5](卷18)。

* 收稿日期:2000-04-05

作者简介:徐东升(1968-),男,汉族,河南正阳人,历史学博士,厦门大学历史系讲师,主要研究唐宋经济史。

但这些钱监除饶州永平监外,至迟在真宗咸平元年(998年)前后已被停废。因为《九朝通略》云:“初,铸钱但有饶州永平、池州永丰”,而池州永丰监置于至道二年(996年),建州丰国监、江州广宁监置于咸平二年(999年)^[6](11之4至6)。所以到咸平二年(999年),宋代只有江、池、饶、建四个铜钱监,此后虽然又有铜钱监兴废,但至天禧三年(1019年)又恢复原来只有4个铜钱监的状况。

天禧三年(1019年)至庆历以前,未见有铜钱监兴废,但随着仁宗于西部用兵,军费浩大,于庆历年间新置阜民、朱阳、博济、济远、永通等五个铜钱监,不过战事结束以后,只有永通监被保留下来,所以到皇祐中,有饶、池、江、建、韶五监,到治平中,随着仪州博济监的复置,宋代铜钱监增加到6个^[7](卷180)。熙丰年间是宋代铜钱监的大发展时期,神宗在王安石的辅助下,力图摆脱“积弱积贫”的局面,积极

推行富国强兵政策,而增加铸钱监又是其措施之一,到元丰三年(1080年),已有铜钱监17个^[2](卷9)。

元祐以后,铜钱监数量锐减。哲宗继位后,于元丰八年(1085年)十二月“戊寅,罢增置铸钱监十有四”^[7](卷17)。日野开三郎认为,所罢十四钱监包括铁钱监^[8],而刘森认为这十四监都是铜钱监^[9]。孰是孰非,尚需考证,但其中包括铜钱监是毫无疑问的。此后,钱监或置或废,但直到北宋末,铜钱监数量都未曾恢复到熙丰时期的水平。

进入南宋,钱监更是受到毁灭性打击。据《宋史·食货下二》:“建炎经兵,鼓铸皆废。”绍兴以后,虽有所恢复,但钱监置废无常,铜钱监的具体数量已难以考察。

其次,铜钱铸造量的变动。宋代不同时期铜钱年铸造量变动很大,但其变动趋势有一定规律可循,具体情况可见表1:

表1:宋代铜钱年铸造量变动

时 间	年 铸 造 量	材 料 出 处
太平兴国初年	7	《梦溪笔谈》卷12
太平兴国八年	30	《宋史》卷180,《食货下二》
至道中	80	《宋史》卷180,《食货下二》
咸平三年	135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16,《东南诸路铸钱增损兴废本末》
景德中	183	《宋史》卷180,《食货下二》
天禧末	105	《宋史》卷180,《食货下二》
天圣中	100	《梦溪笔谈》卷12
庆历年间	300	《梦溪笔谈》卷12
皇祐中	146	《宋史》卷180,《食货下二》
治平中	170	《宋史》卷180,《食货下二》
元丰三年	506	《文献通考》卷9,《钱币二》
元祐四年后	281	《鸡肋编》卷中
崇宁五年	289	《玉海》卷180
绍兴初	8	《文献通考》卷9,《钱币二》
绍兴十三年	10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16,《铸钱诸监》
绍兴二十六年	22	《中兴小纪》卷37
嘉定中	15	《平斋文集》卷31,《吏部巩公墓志铭》
端平中	15	《敝帚丛略》卷1,《禁铜钱申省状》
淳祐初	16	《梅野集》卷1,《四月十二日进讲》

从表1可以看到:宋代铜钱年铸造量从宋初的7万贯,逐渐发展到元丰三年的506万贯,达到鼎盛时期;元祐以后到北宋末年,年铸造量虽然仍很大,但与元丰三年相比,已有较大的衰落;进入南宋,可谓是一落千丈,并从此一蹶不振。宋代铜钱年铸造量的这种变动趋势,与铜钱监数量的变动趋势大体上是一致的,反映了宋代铜钱铸造业的盛衰过程。

二、官府降低铸钱成本的举措

宋代官府铸钱有明显的追求赢利的目的。马

端临说:“宋朝则无时不鼓铸,以开元钱为准,如太平、天禧钱又过于开元。仁宗以前,如太平钱最好,自熙宁以后,不甚佳。国初,惟要钱好,不计工费,后世惟欲其富,往往减工缩费,所以钱稍恶,若乾道、绍兴钱又不及熙丰远矣”。^[2](卷9)“惟欲其富”就是要取得利润,为了达到目的,不惜以钱币质量下降为代价,“减工缩费”,降低成本。宋代在“减工缩费”方面采取了不少措施:

首先,改变料例。“料例”是指铸造一贯铜钱所

需铜、铅、锡的数量和比例。铜、铅、锡虽然不是铜钱铸造成本的全部,却是其中的大部分,因此,料例的变动可以反映铸钱成本变动的趋势。宋代铜钱有折

二、折三、当五、当十、小平钱等多种,只有小平钱铸造历时最久,所以,这里以小平钱料例的变动趋势为例作一说明。关于宋代小平钱料例的变动,可参见表 2:

表 2:宋代小平钱料例变动

时间	料重	净重	原料比例	材料出处及说明
太平兴国八年	4 斤 4 两 3 钱		铜:铅:锡=0.61:0.27:0.12	“铜八十一万斤、铅三十六万斤、锡十六万斤,岁铸钱三十万贯。”(《宋史》卷 180,《食货下二》)
咸平五年	5 斤 8 两	5 斤		《鸡肋编》卷中
天禧三年	5 斤 10 两	5 斤	铜:铅:锡=0.64:0.27:0.09	“凡铸钱用铜三斤十两,铅一斤八两,锡八两,得钱千,重五斤。”(《宋史》卷 180,《食货下二》)
景祐三年	5 斤 3 两	4 斤 13 两		《鸡肋编》卷中
庆历四年		4 斤 8 两		《鸡肋编》卷中
庆历七年	5 斤 3 两	4 斤 13 两		《鸡肋编》卷中
治平元年	5 斤 8 两	5 斤		《鸡肋编》卷中
元祐四年后	5 斤 3 两	4 斤 13 两		《鸡肋编》卷中
绍兴中	3 斤 13 两		铜:铅=0.66:0.34	“绍兴之制,每小钱一千,用二斤半,铅一斤五两。”(《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 16,《铸钱诸监》)
庆元中		4 斤 5 两		(《庆元条法事类》卷 32)
嘉泰中	5 斤 4 两	4 斤 13 两	铜:铅:锡=0.56:0.4:0.04	“铜二斤十五两半,铅二斤一两半,锡三两。”(《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 16,《铸钱诸监》)

从表 2 可以看到,北宋小平钱每贯料重和净重在咸平以后,虽经多次变动,但变动幅度不大;至于原料比例,虽只有两个数据,但结合北宋前期使用时间最长的料例是料重 5 斤 8 两,而这一料例的原料比例是“铜居六分,铅锡居三分,皆有奇赢”^[2](卷 9),可以得出北宋前期铜钱的铜含量多在 60% 以上的结论。尽管北宋铜钱料例变动幅度不大,但从中仍能看出官府的赢利目的。如庆历四年(1044 年)的净重 4 斤 8 两是北宋诸多料例中最轻的,这应和仁宗在西部用兵、所需军费浩大有直接关系。

进入南宋,铜钱的料重和净重骤减,绍兴年间料重不足四斤,庆元年间净重只有 4 斤 5 两,嘉泰年间的料重和净重虽表面上比绍兴年间有较多增加,但具体到每个钱上却不然,而是更轻,这主要是因为绍兴年间“七百七十七文为一千”,而嘉泰年间则是以 5 斤 4 两之料铸小平钱“一千足”,结果“则钱愈锱薄”^[4](卷 16)。

其次,实行定额管理制度。宋代钱监生产实行定额管理,产量定额,工匠数量也定额。为了完成或超额完成生产定额,官府还采取一些配套措施:第一,实行分工协作,把工匠按比例分配在他们擅长的工作岗位上,实行以匠管匠,建立管理组织。

第二,实行计功制度。这项制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保证劳动效率。在产量和工匠都实行定额的情况下,单位时间内每个工匠的劳动量至少要有一个最低标准,这样才能完成或超额完成生产定额。第三,实行奖惩制度。为了保证各项措施得到较好的执行,官府对铸钱的各个环节都规定了奖惩措施,这些奖励措施有利于激励监官和工匠提高劳动生产率,有利于降低成本^[18]。

再次,铸造大钱。金属货币与纸币不同,自身拥有价值,其面值必须与自身价值相符,人为抬高钱币面值,不仅会引起通货膨胀,而且钱币也不能按其抬高的面值长久流通。宋代为了降低铜钱铸造成本,获取赢利,就曾多次铸造大钱。崇宁年间曾铸“当十钱”,“每贯重一十四斤七两,用铜九斤七两二钱,铅四斤一十二两六钱,锡一斤九两二钱,除火耗一斤五两,每钱重三钱。”^[2](卷 9)“当十钱”一个要当小平钱十个,就其料重和面值而言,相差悬殊。从表 2 可以看到,北宋小平钱料重最低者也达到 4 斤 4 两 3 钱,而“当十钱”只有 14 斤 7 两,不足小平钱的四倍。

三、铸钱成本变动及其原因

宋代铜钱铸造成本经历了较大的变动,具体情况可见表 3:

表 3:宋代官铸铜钱成本变动

时间	成本(文)/贯	资料来源及说明
国初	不计工费	(《文献通考》卷 9,《钱币二》)
咸平初	442	江州广宁监“岁铸钱二十万贯,铸钱之费八万八千三百六十贯四百五十,得实钱一十(当为十一)万一千六百三十九贯五百四十五。”(《小畜集》卷 17,《江州广宁监记》)
熙宁初	350	惠州阜民监“岁得钱二十万缗,用本钱外计得子钱十三万缗。”(《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214)
元祐、绍圣间	1000	“费一钱之用,始能成一钱。”(《文献通考》卷 9,《钱币二》)
北宋末	1400—1500	“千四五百钱本,方得一千。”(《龟山集》卷 4,《论时事》)
绍兴元年三年	1750	饶、虔二铸钱司“所铸新钱才二十万缗,而用本钱十二万缗,吏卒之费又二十三万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 71)
绍兴四年	2400	“每铸钱一千,率用本钱二千四百。”(《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 16,《铸钱诸监》)
绍兴二十七年	17000	“每用十七钱而得一钱。”(《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 177)
嘉泰中	1867	泉司岁额增十五万缗,“岁费铸本及起纲糜费约用二十六万缗,司属之费又约二万缗。”(《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 16,《铸钱诸监》)

从表中可以看出,元祐年间可以作为宋代铜钱铸造成本变动的转折点,这时的成本投入与产出相等。在此之前,除国初不计工费外,投入远低于产出,官府可从铜钱铸造中获取利润;而在此之后,投入远高于产出,官府不仅不能从中获得任何直接的好处,而且还要赔折不少。当然,这都是就一般情况而言的,不排除一些特殊情况,如在元祐以后铸钱成本投入通常高于产出的情况下,铸大钱却可以获利。崇宁、大观时所铸“当十钱者,其重三钱,加以铸三钱之费,则制作极精妙,乃得大钱一,是十得息四矣”^[2](卷 9)。所以,总体而言,宋代铜钱铸造成本呈现上升趋势。

尽管宋代官府采取了种种降低铸钱成本的措施,但仍未能阻止长时期内铸钱成本逐渐升高的趋势,其原因主要在物价变动。关于宋代物价变动,全汉昇做了系统研究:仁宗、英宗时代,物价一反宋初以来的下降趋势而向上高涨,神宗、哲宗时代虽再度呈下降趋势,但徽宗、钦宗时代又趋上升;南宋初,物价一天比一天飞涨,不再像北宋那么缓和了^[22](p81—82, p235)。物价低廉,货币购买力高,以货币计算的铸钱成本较低;而物价高涨时,货币购买力低,同样铸一贯钱所需的物料、人工等费则需要数量更多的货币,而铸造出来的货币面值却不能随物价高涨而升高,这必然使铸钱成本随物价升高而升高。如蕲春铁钱监,“本钱四可铸十,铁炭稍贵,六可铸十”^[23](卷 2)。这充分反映了物价对铸钱成本的影响。由此不难理解,宋代铜钱铸造成本何以

呈上升趋势。

四、成本变动与铸钱业盛衰的关系

宋代铜钱铸造业由宋初开始逐步发展,到熙丰年间达到最盛,此后便呈现出衰落趋势;而铸钱成本却呈现逐渐上升趋势。也就是说,铸钱业兴盛时期,铸钱成本低;而铸钱业衰落时期,铸钱成本高。很明显,铸钱成本变动与铸钱业盛衰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但对二者之间的这种联系要有一个正确的估价。首先应当肯定,成本变动与铸钱业盛衰之间的联系主要是由官府铸钱的赢利目的引起的。如前所述,官府为达到“惟欲求富”的目的,采取各种措施降低铸钱成本,但是这些措施没能有效地阻止长时期内铸钱成本不断升高的趋势,这无疑是对官府赢利目的的一个严重挑战,对官府调整铸钱规模产生了重要影响。蔡條《国史补》云:“国朝铸钱沿袭五代及南唐故事,岁铸之额日增,至庆历、元丰间为最盛,铜、铁钱岁无虑三百余万贯,及元祐、绍圣而废弛,崇宁初则已不及祖宗之数多矣。……盖昔者鼓冶,凡物料火工之费,铸一钱,凡十得息者一二,而贍官吏、运铜铁悉在外也。苟稍加工,则费一钱之用,始能成一钱。而当十钱者,其重三钱,加以铸三钱之费,则制作极精妙,乃得大钱一是十,得息四矣。……然利之所在,故多有盗铸,……大观三年,鲁公既罢,朝议改为当三,当三则折阅倍焉,虽县官亦不能铸矣。”^[2](卷 9)可见,元丰以前“岁铸之额日增”,是因为铸钱有利可图,官府可根据需要扩大铸钱规模,而元祐以后铸钱业衰落,是因为“费一

钱之用,始能成一钱”,官府无利可图,自然不如以前热心于铸钱。在铸小平钱无利可图的情况下,铸大钱对于追求赢利的官府而言是个诱惑,铸“当十钱”虽然有铜少之因素,但其主要原因还在于能获得厚利,大观三年当十钱改为当三后,“虽县官亦不能铸矣”,其关键在于非但不能获利,而且要赔折甚多。当铸钱不仅不能获利,而且严重亏本时,官府便不可能大张旗鼓地去铸钱。绍兴六年(1136年),“赣饶二监新铸钱四十万缗,提点官赵伯瑜以为所得不偿所费,遂罢。”^[4](卷16)在这种情况下,铸钱业衰落是不可避免的。

赢利虽然是官府铸钱的目的,但不是惟一目的,如哲宗废罢熙丰时期增置的十四铸钱监,显然不是因为它们亏本,而是出于对新法的否定。这就决定了铸钱成本变动与铸钱业盛衰之间的联系,并不是完全由官府的赢利目的决定的。结合表1和表3,可以看到,铸钱成本的变动和铸钱业的盛与衰,都不是直线上升或直线下降的,而是有所反复:铸钱成本是在不断的反复中逐渐上升的;熙丰以前,铸钱量是在反复中逐渐增加的;元祐以后,铸钱量是在反复中逐渐下降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赢利越多,铸钱量就越多,亏本越多,铸钱量就越少。元祐、绍圣年间,在“费一钱之用,始能成一钱”的情况下,犹能铸钱280余万贯,而咸平初,在442文本钱即可铸1000钱的情况下,咸平三年(1000年)只铸钱135万贯。南宋铜钱铸造严重亏本,但铸钱并没有完全停止,而是一直在进行。因此

铸钱成本变动与铸钱业盛衰之间的关系不是完全的正相关关系。

参考文献:

- [1] 杜佑. 通典[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 [2] 马端临. 文献通考[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 [3] 中兴两朝圣政[M]. 宛委别藏. 影印宋本.
- [4]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 [5] 续资治通鉴长编[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 [6] 宋会要辑稿·食货[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7.
- [7] 宋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8] 北宋时代铜铁钱的铸造额[J]. 食货, 2(1): 21-43.
- [9] 北宋铜钱监述略[J]. 中国钱币, 1988(2): 6-14.
- [10] 沈括. 梦溪笔谈[M]. 上海: 上海书店, 1984.
- [11] 庄绰. 鸡肋编[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12] 王应麟. 玉海[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 [13] 熊克. 中兴小纪[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5.
- [14] 洪咨夔. 平斋文集[M]. 四部丛刊续编.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4.
- [15] 包恢. 敝帚菴略[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 [16] 徐元杰. 梅野集[M]. 乾坤正气集. 同治五年(1866)新建吴坤修皖江印本.
- [17] 庆元条法事类[M]. 海王村古籍丛刊. 北京: 中国书店, 1990.
- [18] 徐东升. 宋代官营手工业定额管理制度述论[J]. 厦门大学学报, 2002, (2).
- [19] 王禹偁. 小畜集[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 [20] 杨时曾. 龟山集[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 [21] 李心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 [22] 全汉昇. 中国经济史论丛[C].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 1972.
- [23] 张世南. 游宦纪闻[M]. 丛书集成初编.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6.

责任编辑 张颖超

Study on the Vicissitude of Copper Cash Casting and Cost Change in Song Dynasty

Xu Dong-sheng

(History Department, Xiamen University)

Abstract: In Song dynasty, copper cash casting develops gradually and reaches prosperity during xining and yuan feng period, after this, takes on the trend of declining; the cost of copper cash casting rises gradually owing to rising Price in spite of feudal official's efforts. So to speak, copper cash casting develops, the cost is low; it declines, the cost is high. Apparently, there is a kind of indiscerptible relation between them, this is caused mainly by feudal official's profit-making aim, but profit making is not the only aim of casting copper cash, this causes the relation not an absolute positive correlativity.

Key words: Song dynasty; copper cash casting; cost